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童星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历史创造。邓小平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发明者,并着重从历史创造主体的被动性、受动性方面对其予以阐释。习近平继承发展了这一概念,为历史创造主体增添了主动性、能动性色彩。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基本特征,其中每一个都充满了可能的社会冲突风险: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了“人机冲突”风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蕴含了“人人冲突”风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蕴含了“人心冲突”风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了“人地冲突”风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蕴含了“人天冲突”风险。清醒认识这些风险是化险为夷的前提,真正防范化解这些风险,有赖于历史创造主体正确处理创造活动的主动性与被动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社会冲突风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5)01-0003-09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历史创造。说到历史创造,不能不想到马克思的名言。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p.669)]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既然是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充满着创造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而又充满着被动性、受动性。历史创造主

体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引致风险。只有正视并化解这些风险,方能取得历史创造活动的成功。

一、邓小平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伟人邓小平。早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就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p.163)]这一宣示表明了中国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展示的是历史创造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历史创造活动的被动性、受动

收稿日期:2024-11-10

作者简介: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性,即从我们的先辈那里承继下来的国情——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2](pp.163-164)}。

历史创造主体在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会引致风险。邓小平举例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2](p.164)}这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妥善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的信心。

综上所述,邓小平论“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强调了要正视这一历史创造活动中主体的被动性和受动性。既然“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因此“解放思想”就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既然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然也不能陷入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境地。

还要看到,中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参天大树”,国际环境也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显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还要考虑到所处的国际环境,处理好国际关系。

还是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p.237)}他后来又多次阐释何谓“小康”,其中最概括也最形象的解释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3](p.109)},并且强调,“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3](p.54)}。这就成功地消除了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疑惑和恐惧。

正是基于此,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2](p.417)},还将其与国内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相并列,称其为克服风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项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小康之家”,又不限于“小康之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小康”和“大同”之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①。近代康有为提出“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康有为高足梁启超认为,康有为的“三世说”与孔子的“小康大同说”异曲同工,“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而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用“大同”释“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则用“小康”喻“现代化”。实现“小康”不是目的,只是奔向“大同”的必经途径,后面的路更长更艰苦。1993年9月,在中国摆脱了贫穷、实现了温饱、直奔小康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4]。

二、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界定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就将超越小康阶段继续前进了。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这个界定既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身国情的五大特征。我们通过分析这五大特

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并非每个特征都是中国所独有。例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特征印度显然也具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特征北欧五国就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少发达国家做得也不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加坡等堪称楷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尽管历史上大国中特别是第二大经济体好像没有,但小国如此的却不在少数。既然如此,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仍然是必要的。那种以为搞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脱离世界现代化潮流关起门来自己干的想法,是不足取的。

第二,五大特征都具备者,则非中国莫属。这五大特征之间既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如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也不乏一时难以兼容甚至顾此失彼的关系,如在“人口规模巨大”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个别经验,也不能无限夸大其中的某个特征而不顾及其他。“五位一体,统筹兼顾”才是正道。正如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既体现了历史创造主体的被动性、受动性,主要是指特征之一“人口规模巨大”;更突出了历史创造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主要是指后四个特征。如果说强调历史创造主体的被动性、受动性,容易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需要防止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话,那么强调历史创造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则容易背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犯盲目乐观、急躁冒进的错误。一旦在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失衡,就会出现冲突风险。为了坚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防止或消极悲观、无所作为,或盲目乐观、急躁冒

进,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做到有备无患。

三、中国式现代化可能面临的风险

我们就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的顺序,依次考察这些风险。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可能面临“人机冲突”风险

上述邓小平当年以举例方式提出的“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目前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国每年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逼迫政府年年推“专项行动”、高校年年搞“访企拓岗”,学生则信奉“宇宙尽头是编制”,忙着考公考编。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研究生扩招愈演愈烈,不仅增加了博士后工作站,还创新出“学士后”岗位。其实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的解决往后推。更为严峻的是,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加速推进,机械手、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代替了人手,排挤了蓝领工人;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Open AI的ChatGPT横空出世,谷歌的Gemini后来居上,许多原先以为专属人类的专业性、创新性乃至情感性工作岗位都被人工智能攻克,这又使得许多服务业、专业性的白领工人饭碗难保;越来越多的智库研究预测“现在大多数职业在未来10年内将会消失”,惹得人心惶惶。前不久武汉推出“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遭到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强烈抵制。所有这些都显示,“人机冲突”的风险在急剧且持续地积累。加之国际产业链重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的外资撤离和民营企业遭遇困境,邓小平所担忧的“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挥之不去的现实。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对待。

首先,在就业问题上要将长期以来的“经济建设话语”转换为“社会建设话语”。经济建设话语优先关注经济的增长、资本的增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在经济建设话语下,

就业仅仅是经济增长和资本增殖的工具、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升的手段,就业的数量规模及收入分配必须服从经济增长和资本增殖的需要,也必须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升的需要。而在社会建设的话语下,就业是“民生之本”“最大的民生”,强调的是确保就业,坚持共建共享,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建设话语同社会建设话语有时候会出现冲突。例如,当可以用机械手替代人手、机器人替代劳动者时,按照经济建设话语,就会毫不犹豫地促成或实施这种替代,因为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增殖,也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升。可是按照社会建设话语,既然就业是“民生之本”“最大的民生”,那就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机械手替代人手、用机器人替代劳动者。只有在招收不到劳工,或者由于使用人工去从事某些劳动有害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甚至有悖于人道时,才应毫不犹豫地促成这种替代,除此以外的领域,则应平衡效益和就业。也就是说,在对待机械手替代人手、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的问题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当有所不同。

其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平衡兼顾,要通过厘清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得以落到实处。企业服从市场逻辑,以效率为先,积极充当机械手替代人手、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的推手,这是社会分工使然,是企业职责使然,无可厚非;政府则必须以人为本,实施积极促进就业的政策,规范企业用机械手替代人手、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的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最后,需要本着正确处理人机矛盾的视角,调整某些政策。以社会保险缴费政策为例,现在对劳动关系明晰的企业而言,企业按照雇佣员工人数及其工资总额缴费,因而吸纳就业越多的企业,缴费负担也就越重,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利,对企业扩大就业而言,属于负激励机制;对新兴的平台经济而言,劳动者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缴费,平台企业并不为他们配套缴纳相应的五险一金,这也不利于平台经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人工智能还处在发

展初期,其发展速度遵循着“摩尔定律”,每18~24个月芯片上所集成的电路数翻一番、微处理器的性能翻一番、价格降一半^③。其发展前景特别是它与人类的关系将走向何处,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其头部企业 Open AI 的最高层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与战略都发生了激烈的“内斗”,“内斗”的双方分别由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领衔。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隐含的风险。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可能面临的“人人冲突”风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基本上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阶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关”和“闭”,即对内“关闭”、对外“闭关”。此后,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放”和“开”,即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前后这一变化,激发起社会的活力、家庭的活力、个人的活力,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陆陆续续地先富起来。原以为先富帮后富,最终就能实现共同富裕。愿望相当美好,现实不尽如人意。尽管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并实施了扶贫脱贫、对口支援、结对帮扶等措施,但贫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其实,相对于由共同贫穷到一部分人先富来说,由贫富差距过大到共同富裕则更加困难。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宏观上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冲突历久弥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奉行平均主义,结果造成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平均主义受到批评,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的不公平现象。可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理想,是相对的;而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则是现实,是绝对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统一”等原则,我们都坚守过,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市场能够保证效率不断提高,却会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应当秉持公平原则对社会收入分配予以调节。然而,政府调节并非都能弥补市场缺陷,

搞得不好还会引出两种结果：一是调节方向不对，反而扩大了市场缺陷，造成更加不公平，这在政府直接办企业、行使企业职能、与民争利的情况下极易发生；二是调节力度过大，破坏了市场秩序，甚至直接把企业整垮，导致效率流失，遑论公平。

其次，从中观上看，存在着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利益是人们行动的最现实的动力。爱尔维修(Helvétius)曾经形容说：“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6](p.460)} 马克思也写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p.103)} 利益相同的人通常会形成一致的行为动力，从而产生共同的行动，因此利益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利益和行动之间的内在机制可称为“利益动力机制循环连续统”^{[8](p.71)}（参见图1）。在这个循环连续统中，评价是关键的一环。评价的根本依据是“利益”，直接依据是由利益规定和引致的“目标”，对象则是行动的“效果”。当效果与目标、利益一致或者较为接近时，评价就是正面的、满意的；当效果与目标、利益不一致或者偏差较大时，评价就是负面的、不满意的。于是，无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政府调节的结果，同一利益群体内的评价往往相同，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评价则常常相左，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而产生并在特定的条件下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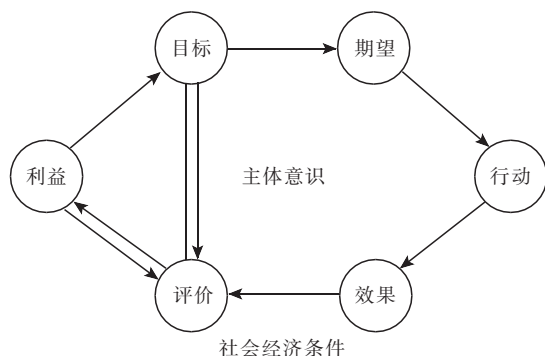


图1 利益动力机制的循环连续统

再次，从微观上看，上述评价环节除了有依据、对象外，还有其心理基础。心理基础又分绩效主义心理与平均主义心理两种。所谓绩效主

义心理倾向，是指人们期望以工作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即工作绩效）来换取满足需要的有效程度（即心理绩效），并期望工作绩效与心理绩效成正比。可见，绩效主义心理倾向重视投入和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承认人们在能力、技术、资产、机会、天赋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追求有差别的收入。而平均主义心理倾向则重视收益分配中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承认人们在权利和需要方面的平等，从而追求无差别的收入。诡异的是，这两种似乎完全对立的心理倾向扎根于同一个人心中。当他有能力、技术、资产、机会、天赋的时候，或是他同能力、技术、资产、机会、天赋和工作成绩不及自己的人比的时候，通常倾向于绩效主义；而当他没有能力、技术、资产、机会、天赋的时候，或是他同能力、技术、资产、机会、天赋和工作成绩超过自己的人比的时候，通常又倾向于平均主义^[9]。有鉴于此，在何谓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人们很难形成共识；在如何评价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举措时，人们也很难取得一致；甚至同一个人都会随着时间、地点、事项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最后，还要看到我国是个“大国”。现在世界上共同富裕状况比较好的国家，一般国土面积都不大、人口规模较小，如北欧五国等，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必然带来国内各区域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交通状况、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差距悬殊；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其内部在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也巨大。这就明显加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长达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模式基本结束，“经济新常态”甚至“经济下行”阶段已经到来。在经济高速发展时，依托巨大的增量可以较为自如地予以利益调整、推进共同富裕；而在“经济新常态”甚至“经济下行”时，增量基本上被新增人口的需求抵消，国家只能动用经济存量来予以利益调整、推进共同富裕，这就会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可见难度极大。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可能面临“人心冲突”风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变迁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往往快于精神文化的发展,由此就会产生文化失调,导致社会成员精神空虚、行为失范。这种文化失调在后发国家更容易出现,因为后发国家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现代化经验时,通常都是先学器物等外显的现代化,而非精神文化等内涵的现代化^[10]。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甚至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与现代化并不冲突甚至有助于现代化的积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提及,在欧洲工业革命中,加尔文教派和清教徒扮演了最积极、最勇猛的角色^{[11](p. 536)[12](pp. 789—790)}。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具体解释了来源于传统的宗教因素何以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13]。而且传统文化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传统文化的危机会削弱社会凝聚力。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难题,历经曲折,经验教训丰富,终于达成了共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4]。如果现代化发展道路完全逆着传统走,就可能在强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遭到夭折;如果完全沿袭传统,又将与现代文明绝缘;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同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获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这个充满着风险挑战的难题及其解答将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经济原则与文化原则的冲突。经济活动作为谋生手段,它的更新总比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来得快,因此人在追求物质享受和心灵满足二者之间常常失衡。尽管不少有关道德滑坡的评价的出现,是由于所依据的道德评判标准过于陈旧,但道德滑坡更多的还是来源于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缺失。这就需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然而,客观规律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与更新总是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建设与更新,这就容易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如下种种观念,如“发展市场经济,就无法抓好思想道德教育”“经济发展好了,思想道德建设自然会上去”“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以后再抓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迟”等。过去如此,今后还会如此。这些观念和道德缺失的现象,也将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在现代与传统、经济原则与文化原则之间发生冲突的同时,精神文化自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伴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信息获取的便捷与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利益的分化与固化,人们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尽管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信息交流越来越便捷,但许多人却生活在“信息茧房”中,人们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少,互信越来越弱,沟通越来越难,戾气越来越重。因“三观”不合就朋友圈“拉黑”,或实施网络暴力,已是司空见惯。这些都表明,“人心冲突”风险仍在集聚。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能面临“人地冲突”风险

这里所说的地首先指耕地,但又不限于耕地,还指代国土面积乃至整个自然环境。“人地冲突”始终存在: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的世代,“地”压迫“人”;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则“人”往往伤害“地”。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既要改变“地”压迫“人”,又要防止“人”伤害“地”。我国当前的“人地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尽合理。人们经常描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相对于14亿人口,我们的“地既不大,物也不博”。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支撑现代化发展,许多农产品和能源资源需要进口,这就难免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特别是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风险很大。而且,国内资源能源的分布不尽合理,“胡焕庸线”东南和西北两部分,国土面积相当,但人口承载量之比竟高

达 95 : 5,“地大物博”与“人口众多”分离;南方淡水资源丰富,但缺乏能源矿产,影响经济发展,北方缺乏淡水资源,其能源矿产丰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国家不得不耗费巨资,进行“南水北调”和“北煤南运”。在早期发展中,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以为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为资源无价,可以无偿使用;以为资源无主,谁开采就归谁所有”^[15](pp. 66-67)],于是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加剧了资源的短缺。

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在发展中,人们一方面不断从大自然汲取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大自然抛出垃圾,包括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一旦垃圾过多,环境无法自净,就形成了环境污染。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各国政府、学术界和普通百姓有不同的认知和选择,大体分为四种:坚信地球有充分的自调节能力,人类只要考虑发展,无须庸人自扰;主张“先发展,后治理”;实施“边发展,边治理”;坚持“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在现代化初期,我国多数地方采用的是前两种方式,少数地方实施第三种策略,结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广袤的城乡均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环境问题,污染严重,水、土、空气的质量持续下降,环境事故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还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党的十九大又将污染治理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并称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三大攻坚战”,提出加快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这样做的成效非常显著,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遏制,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是极端天气频发,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威胁。“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16]在当前全球极端天气条件下,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尤其

是大城市的“五岛”效应即热岛效应、干岛效应、湿岛效应、雨岛效应和浑浊岛效应愈发显著,不断放大着气象灾害的严重后果;广袤的农村则基本不设防,防灾减灾能力相当薄弱。人来源于自然,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诚然,现代化是一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7](p. 998)]。恩格斯这一警告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铭记在心。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能面临的“人天冲突”风险

这里所说的“天”并非日常话语中与地、人相对应的“天”,也非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而是指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来自他人、他国和国际社会的可以预知和难以预知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望,当然,这并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2](p. 417)]。

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中,不乏通过和平发展道路而如愿以偿的,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小国。大国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的尚无先例^④。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予以解释。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发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结果导致二者间的战争。艾利森借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表达: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遏制和打压新兴大国,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不可避免。当然

对这一概念及其表达的结论,学者和政治家之间仍有严重分歧。二战后,国际上先是形成了美苏对峙争霸的冷战;随着中国的发展,转变为美苏中“大三角”态势;苏联解体后,又形成美中俄“大三角”态势。当前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和争执,主要围绕着中美关系展开,焦点在于: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

如前所述,邓小平一直认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并致力于为中国式现代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起步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3](p.127)}。他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直言“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3](p.156)};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3](p.96)}。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邓小平又及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等战略方针,使我国外交局面焕然一新^⑤。在新旧世纪之交,我国又先后抓住国际反恐、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现在的国际局势包括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要想重新回到过去已全无可能;但是,对国际局势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坚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殚精竭虑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图民生,这是不确定中唯一的确定!

总之,我们不想战争,但也不怕战争!我们全力争取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但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5]

四、结语

古人云:“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⑦。清醒认识上述这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冲突,是化险为夷的前提。

而要真正防范化解这些风险,则有赖于正确处理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明显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被动性、受动性,但只要 we 充分发挥好人口规模的优势、利用好人口红利,其被动性、受动性没什么了不起。同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明显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动性、能动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被动性、受动性的一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达成,受制于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中观上利益群体的存在、微观上心理倾向的影响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希望落实,受制于传统与现代矛盾的调处、经济原则与文化原则冲突的调处以及多元价值观的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实现,受制于资源、环境、气象、灾害等实际状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与否,也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拿捏。在历史创造活动中,处理好了主动性和被动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关系,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处理不好主动性和被动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加剧风险,乃至失败。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注释:

①参见《礼记·礼运》。

②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

③摩尔定律并非真正的科学定律,仅是内行人、英特尔合作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的经验之谈,不过几十年来,该定律一直被信息技术的发展实践所证实。

④德国和日本的情况很特殊。20世纪30—40年代,它们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走上穷兵黩武的战争之路,结果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最终惨败;战

后在联合国和美国的逼迫下,摒弃战争,和平发展,将一片废墟重新建成现代化强国。

⑤参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的回忆,载《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4页。

⑥《礼记·中庸》,豫,通“预”。

⑦《论语·卫灵公》。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石仲泉.邓小平的初心与中国人民“富起来”[DB/O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9/0819/c85037-31302275.html>,2019-08-19.
-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
-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8]童星.社会改革控制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9]童星.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判定[J].江苏社会科学,1995,(1).
- [10]童星,李正军.论发展的文化可承受性[J].南京大学学报,1996,(3).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上海:三联书店,1987.
-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 [15]余谋昌.惩罚中的醒悟[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16]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N].人民日报,2016-07-29.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英秀]

Possible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ng X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historical creation being made by the Chinese people. Deng Xiaoping is the inventor of this concept and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e passivity of historical creators. Xi Jinping has developed this concept and added proactivity to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cre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f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 each of which is full of possible social conflict risks: modernization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contains the risk of “human-computer confli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arries the risk of “conflict between each other”; the modernization that harmonizes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arries the risk of “conflict of mind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arries the risk of “human-nature conflict”; the modernization that follow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arries the unforeseeable risks of “external conflic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sks is the prerequisite to avert danger. To truly prevent and resolve these risks, it depends on the historical creators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itiative and passivity, and between initiative and passivity, and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ir best effort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isks of modernization, risks of social conflicts